

荷属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 吧城华侨人口分析

黄文鹰
陈曾唯 著
陈安尼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一九八一年三月

目 录

(一) 引言	1 — 3
--------	-------

第一部份：历史背景	4 — 22
-----------	--------

(二) 一千年来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的分布情况	4 — 12
------------------------	--------

1400年以前外岛华侨人口多于爪哇。——1400—1900年爪哇华侨人口多于外岛：前二百年(1400—1600)爪哇华侨人口增长速度缓慢，后二百年(1600—1800)速度加快，最后一百年(1800—1900)速度又减慢。——1900—1930年外岛华侨人口多于爪哇。

(三) 一千年来爪哇华侨人口的分布情况	12 — 18
---------------------	---------

1500年以前爪哇华侨人口中心在东爪哇，早期以杜板为代表，后期以锦石为代表。——1500—1800年爪哇华侨人口中心自东向西移动，前一百年以万丹为代表，后二百年以吧城为代表。——1800—1956年爪哇华侨人口中心开始自西向东移动，前一百年以中爪哇的三宝壟为代表，后五十年以东爪哇的泗水为代表。

(四) 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吧城华侨人口的重要性	18 — 22
-------------------------	---------

吧城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人口中心和经济中心。——吧城是荷兰东方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

第二部份：基本情况	23 — 67
-----------	---------

(五) 吧城人口资料的时间标志和空间标志	23 — 31
----------------------	---------

时间标志：年终公告人口数字代表当年的平均人口状况，年初公告人口数字代表上年的平均人口状况。——空间标志：十七世纪的人口数字仅指城区而言，包括城池及南门外近郊；十八世纪的人口数字分城区和乡区两部份，城区指城池及离城二英里以内的近郊，乡区指离城二英里至二十五英里不等的地区。

(六) 吧城居民人口的分类	32 — 35
---------------	---------

按种族血统分：荷兰人、欧亚混血后裔、中国人、获释奴隶、摩尔人及爪哇人、马来人、巴厘人、奴隶。——按法律身份分：公司职员、

公民、外国人、奴隶。

(七) 吧城华侨人口数字的推估

36 — 45

十七世纪城区华侨人口：利用人头税材料推估 1658—1663 年城区华侨人口数。——十八世纪城乡华侨人口：利用莱佛士人口统计材料推估十八世纪城乡华侨人口数。

(八) 吧城华侨人口数字的可靠性

46 — 51

1619、1620、1628、1673、1674 等年华侨人口数字的考证（附荷印币制说明）。——人头税出包以前，官方公告数字接近于负税人口；人头税出包以后，官方公告数字接近于负税人口加眷属人口。——官方公告数字相当于华侨实有人口数字的下限，上限应比下限高 20%。

(九) 吧城华侨人口的构成

52 — 67

1、职业构成

1742 年吧城华侨人口的职业岗位调查。——从事手工业及种植业者占华侨职业人口的 77%，从事商业者不到 23%。——蔗糖业人口在华侨总人口中占居绝对多数，蔗糖业的盛衰应为华侨人口升降的重要因素。

Ⅱ、性别和年龄构成

57 — 62

吧城华侨人口的鲜明移民色彩：成年人口及成年男子人口比重高。——移民入境为吧城华侨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城区未成年人口性别指标的严重偏离及其生成原因。

Ⅲ、出生地构成

62 — 67

男性人口以国内出生为主，绝大多数为国内移民。——女性人口以当地出生为主，就中又以与华侨结婚的当地妇女为多。——当地出生人口颇多世系湮远，在东南亚华侨人口中别具风格。——国内出生地的分布以福建漳泉居多，占十之六七；有历史原因，也有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原因。

第三部份：升降变迁

68 — 153

(十) 1619—1661 年吧城华侨人口的升降变迁

68 — 83

吧城华侨人口的上升期。——公司大力招徕中国移民：重建椰加达，垦地种稻，种蔗糖。——公司对华贸易。——船只与移民之间的关系。——公司对华生丝的强烈需求。——大力招徕中国船只。——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的大变乱，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大批人口流离失所。——驶吧华船载运人数及其对吧城华侨人口升降的影响。

(十一) 1662—1682年吧城华侨人口的升降变迁

83 — 86

吧城华侨人口的下降期，出现华侨人口低潮。——清政府厉行锁海迁界，严禁片帆寸板下海，华船停航，移民中断。——华船作为公司对华贸易的中介作用暂告中断。——公司对待华侨政策的转变。——恢复人头税，华侨离境他迁。——公司鼓励荷兰本国移民东来失败。

(十二) 1683—1700年吧城华侨人口的升降变迁

87 — 95

吧城华侨人口的回升期，由低潮向高潮过度。——海禁开放，华船驶吧络绎不绝，西方船只亦相继来华通商。——公司对华直接通航贸易，因福建沿海官商操纵，无利可图自动放弃，需求中国商品仍然借重驶吧华船。——公司开辟亚洲蔗糖市场，吧城糖业生产扩大，需求大批中国移民。

(十三) 1701—1739年吧城华侨人口的升降变迁

96 — 119

吧城华侨人口的繁盛期，出现人口高潮。——茶叶贸易，中国茶叶在公司贩运商品中占居首要地位。——1717—1722中国茶船停航事件。——1728—1734荷兰与广州之间直接通航贸易，后因公司现金缺乏而中断。——对华茶叶贸易依靠中国茶船符合公司利益。——十八世纪初欧洲糖价暴涨，吧城糖业生产盛况空前。——蔗糖主输入大批中国劳力，限制移民禁令一再失效。——1710年以后吧城糖业生产盛衰的商榷及其对华侨人口的升降影响和就业影响。——国内农村阶级分化加剧，土地兼并之风炽烈，农民辗转流亡。——海禁进一步放宽，废除造船限制。——1717—1722清政府局部恢复海禁及其与茶船停航事件的联系。——华侨归国之禁及其影响。

(十四) 1740—1779年吧城华侨人口的升降变迁

119—131

吧城华侨人口的剧烈变动期，华侨人口由高潮骤然转入低潮又迅速走向更大的高潮。——红溪惨案大屠杀，其经济背景及经济后果。——惨案过后吧城当局大力招徕中国移民，华侨人口迅速恢复。——公司鼓励荷兰本国移民东来再度失败。——中国移民入境日增，限制禁令日繁。——乡区华侨人口进一步积聚。——“侨生”人口日益增加，自成体系。

(十五) 1780—1800年吧城华侨人口的升降变迁

135—151

吧城华侨人口的下降期。——吧城经济全面萧条，华侨纷纷外迁。——吧城疫病流行，华侨死亡日众。——华船驶吧减少，移民入境锐降。——公司大力恢复对华直接贸易，全面包揽中印之间的商品货运，华船无货可贩。——华船商品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为力求贸易有利，日益转向贩运“苦力”，苦力既是高死亡率威胁下的吧城所欢迎，又是当时公司船只所无法经营；贩运吧城可免付港租、秤税、交易税等费。在海上航行又可避免海盗袭击。——船身结构加大，运载能力增强。——

吧城当局同时发动“人头税”和“载入限额”两条杠杆来招徕中国移民，但因华船驶吧过少，收效不著。

(十六) 结束语

152—153

附录

1、1850—1930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分布统计	154
2、1815—1956爪哇华侨人口分布统计	155—156
3、1673—1682吧城城区各族居民人口统计	157—162
4、公司时期华侨人头税率变动表	163—163
5、莱佛士所整理的十八世纪吧城城乡“欧洲人及原住民”人口统计	164—165
6、1740年红溪惨案前后吧城城区华侨人口统计	166—166
7、公司时期吧城华人事务机构人员名额变动表	167—167
8、公司时期华船驶吧统计	168—169
9、公司时期华船驶吧进口税率变动表	170—170
10、公司时期华船载入限额变动表	171—172

后记

173

(一) 引言

在西方研究华侨问题的文献中,凯特博士著《荷印中国人的经济地位》被认为是一部权威著作,是“在阅读大量荷文文献的基础上写成的,是对研究荷印生产者之间关系的一项特殊贡献。”^①著者非常重视历史的研究,认为只有在史的考察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有关华侨的正确结论。他说:“今天没有人认为中国人对于法律和秩序会是一个危险,但是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荷属东印度的历史,就会发现确保社会安宁绝不是中国移民的固有天性。”^②接着又说:“随着1596年荷兰人的到达东印度,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面前就开始了—一个需要分别予以探索的时期,因为东印度公司在它存在的一个世纪里,对待中国人几乎一贯是采取友好的政策,中国人从中获得了许多好处。”^③

在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中国移民前往印度尼西亚究竟是和平定居?还是威势社会安宇?殖民统治者对待中国移民是一贯友好?还是一贯奴役?要回答这些问题,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确实是一个需要分别予以探索的时期。

但是从考察华侨人口史的角度出发,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之需要分别予以探索,还有着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这个时期不仅涉及整整十七、十八两个世纪,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荷兰统治印尼的一个完整历史阶段。列宁说:“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去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④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分期如何,今天印度尼西亚史学界还在论争,但是就爪哇历史来说,东印度公司的二百年统治未始不代表着一个西方商业资本垄断掠夺的完整阶段。东印度公司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组织,它是荷兰帝国的化身,拥有国家所拥有的全部暴力,被赋予征兵、造币、立法、任免官吏、签订条约、建立据点等等权利^⑤,这个暴力组织一旦侵入印度尼西亚之后,就在原有的封建残暴专制基础上,建立

①W·J·凯特:《荷印中国人的经济地位》(W·J·Gator:《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牛津,1936年。第Ⅺ页,太平洋关系学会秘书长H·C·卡特(Carter)所作序文。

②同上,第Ⅺ页。

③同上,第6—7页。

④《列宁全集》,第一卷,第450页。

⑤A·G·凯勒:《殖民》(A·G·Keller,《Colonization》)波士顿1908年,第393—394页。

起一整套更加残暴的西方殖民专制——“强入制度”^①、巡航洗劫(Hongi)、无偿供应、强迫征购等等。这套殖民专制带给爪哇人民的灾难，同过去任何灾难对比起来，都不知要深重了多少倍。马克思曾经借用莱佛士在谈论爪哇农业时所说的如下一段话，来刻划东印度公司的狰狞面目。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赚钱，它对待自己的居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植场主人对待他们的奴隶，因为这些种植场主买人的时候还付过钱，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文钱都没有花过。它只运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构压榨居民，使他们把最后一点东西都交纳出来，把最后一点劳力都贡献出来。这样，它就加重了任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因为它是把政治家的全部实际技巧同商人的全部垄断利己心肠结合在一起进行统治的。”^②

我们再借用莱佛士的另一段话，来说明东印度公司对爪哇商业的摧残：

“要追述一个重商主义政府的短见专横、悬借暴力的贪婪掠夺以及摧毁万物的垄断独占，究竟在怎样一种程度上和在怎样一种情况下伤害和窒息了爪哇人的原有商业，使它的性质发生转变，它的重要性开始衰退，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爪哇人的原有贸易在荷兰殖民政策的严格限制下，几乎全部消灭了，至少是大大不同于过去了。当然，应当承认，有些部门由于欧洲资本的输入或是欧洲市场对于某些商品的高价需求得到了刺激和繁荣，但是这远不足以补偿爪哇人的原有商业的消失，这种商业就象爪哇的任何一种植物一样是这个国家自己所培育起来的。”^③

在如此残暴的殖民统治下，爪哇人民所身受的痛苦真是罄竹难书，只要是荷兰人的“足迹所至，随即发生荒废与人口消灭的现象。”^④爪哇人民如此，中国侨民亦然。往日中国船只可以自由航驶，互通有无，现在则备受公司的限制和摧残，一切活动都只能在公司的约束下进行，航行须请领执照，货物不得自由买卖，往日中国移民可以自由往来，和睦定居，现在则备受公司的奴役勒索，居住要集中，出入要准字，在殖民地的等级社会中，华侨被列入最低贱的“自由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惨绝人寰的“红溪大屠杀”，华侨罹难者，虽妇孺亦无幸免，其灾难深重，纵使不亚于印度尼西亚人民，至少也不亚于印度尼西亚人民（详见后文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华侨人口的升降变化就不能不具有区别于其他时期的独特形式和内容，为了便于系统考察这些形式和内容，我们也有必要将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单独划分出来。

其次，吧城是荷兰帝国的东方政治经济中心，也是荷印华侨的人口中心。在东印度公司整整二百年的统治时期里，吧城是唯一一个始终置于公司的直接统治下的地方。我们找不到第二个地方能象吧城那样，从其发展变化可以看出殖民统治者是如何通过种种政治经济措施，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华侨经济的盛衰，从而影响华侨人口的升降。我们从史的发展来探索印尼华侨人口问题，既然要把公司统治时期单独划出来，那就理所当然地要把视野集中在

①《资本论》，第1卷第950页。

②《马克思全集》第九卷，第144—5页。莱佛士语见《爪哇史》第1卷，第168页。

③莱佛士：《爪哇史》第1卷第213—4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50页。

吧城上面。

人口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它的增减变化取决于多种因素，社会条件的变迁会影响到人口的升降，自然条件的变迁也会影响到人口的增长；而华侨人口又关系到国与国之间的人口移动，其增减变化就更加错综复杂，既有国内原因，又有当地原因，前者说明华侨之所以出国，后者说明华侨之所以定居。出国原因较为普遍意义，未必因侨居地而异；定居原因则较为特殊，随侨居地而不同。下面我们想分别就这些方面来探索吧城华侨人口的变迁。

第一部份：历史背景

(二) 一千年来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的分布情况

1400年以前外岛华侨人口多于爪哇。——1400—1900年爪哇华侨人口多于外岛；1400—1600年爪哇华侨人口增长速度缓慢，1600—1800年爪哇华侨人口增长速度加快，1800—1900年爪哇华侨人口增长速度减慢。——1900—1930年外岛华侨人口多于爪哇。

华侨定居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姑不论地下的考古发掘，单是凭文献的记载，也有一千多年了。要对这一千多年的华侨人口分布和变迁给予数量上的描述，即使是十分粗略，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历史文献很少明确提到华侨，更少明确提到华侨人口数字。以研究华侨史著称的日本学者成田节男就这样写到：

“从来关于华侨的文献都只写到暗示华侨存在的程度，要据此以考察华侨的人口和生活，就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①

“在中国文献里，全然没有有关华侨人口的统计史料，因此无从知道华侨的发展程度。有关华侨的人口统计……是欧洲人在南洋建立殖民统治以后的事，在此以前，即使是推估也几乎是不可能的。”^②

当然，殖民统治者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掠夺需要，不能不进行有关包括华侨人口在内的当地人口统计，但是荷兰人初期所提供的人口资料，同我们今天的要求比起来还是有着很大的距离。首先是数量不足，荷兰统治印尼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单是爪哇一地就几乎整整耗用了二个世纪。^③荷兰人有关爪哇的第一张地图是迟至东印度公司的后

①成田节男《华侨史》，第97页。

②同上，第181页。

③H. Blink:《荷属东印度的地理、人种及经济概况》(Nederlandsch Oost-en West-Indië, Geographisch, Ethnographisch en Economisch Beschreven), 第1卷, 第428页。

半期,即1726年F·Valentyn的《爪哇概况》(Beschrijving van Groot Djawa of the Java Major)一书出版之后才行问世的,在当时荷兰人对于爪哇的地理知识很贫乏,除了沿海地区之外就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在吧城附近为了出卖土地要确定四至,才进行土地丈量,其他重要地区直到公司关闭之后才开始收集一些统计资料。^②因此荷兰人早期所提供的人口资料,也只是局限于吧城一隅。同时这些资料的质量还是很低,一如莱佛士所写的:

“根据荷兰人的行政管理准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最近,荷兰人就一直没有想到要认真进行统计调查,即使进行了,在那种陈腐的管理制度下,也不可能得到可靠的材料。”^③因为当地人民都把殖民统治者所举办的“任何有关国情的统计调查,都看成是一种实行新税或勒索的前奏,因此他们总是设法隐瞒人口的真实状况。”^④

材料残缺既是如此,要全面描述人口分布,显然并非易事;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尽可能地勾画出一个粗略的轮廓来。

下面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近时的印度尼西亚西至幅员,按照传统区划,分为“爪哇”和“外岛”两个部份,爪哇包括马都拉,外岛包括爪哇以外的各个岛屿。

如果说自汉书地理志以来有关中国人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通商贸易,以及自东晋法显以来有关求法高僧的稽留爪哇和苏岛等记载,都还不能认为就是中国移民前往定居的确证,那末至少到五代十国,爪哇和外岛就几乎同时出现了有关中国移民前往定居的明确记载了。

阿拉伯人马素地(Masudi)在所著《黄金牧地》一书中说,当他于943年途经苏岛时,就看见有许多中国人因避内乱(即黄巢起义)前来定居,特别是在旧港地区。^⑤根据爪哇史乘的记载,大约在950年有在掌西朗(Janggala)王国国王Panji Ino Kerta Pati在位的时候,有一只中国大船在爪哇北部海岸沉没,船员流落在扎巴拉、直葛、三宝垄一带,船主献宝石与王,获允召集船员就地定居。^⑥

如果上述记载是合乎事实的话,那么在时间上,苏岛华侨的定居应先于爪哇华侨,因为黄巢起义是发生在公元878—884年,爪哇华侨的定居早了八十年,在人数上,苏岛华侨似乎也比爪哇华侨来得多,姑且不谈此后尚陆续移入,单是八十年的自然增殖,也就大大超过爪哇的一般遇潮水平了。就当时的路程来说,苏岛离中国近,宋时自三佛齐“汎海使风,二十日可至广福”^⑦这同东晋义熙八年(412)四月法显自爪哇搭船返国,“商人议言,常行月朔,可五十日便到广福”^⑧同安淳化三年(992)十二月阁婆国使自爪哇

① 莱佛士:《爪哇史》,第1卷,第6页。

② 莱佛士:《爪哇史》,第1卷,第6页。

③ 同上,第74页。

④ 同上,第69页。

⑤ G·G·Galine:《Ptolemy东亚地理的研究》(Researches on Ptolemys Geography of Eastern Asia),第621页。

⑥ 莱佛士:《爪哇史》,第1卷,第98页。

⑦ 《宋史》,卷489,三佛齐传。

⑧ 足立志六:《法显传》,第259页。

“使汎舶船，六十日至明州定海县”。^①《明史纪事本末》（1293）四月“元军败退，自爪哇“登舟，行六十八日夜，达泉州”^②等等记载比较起来，三佛齐距中国的航程似乎比爪哇短了三分之二，中国移民前往三佛齐似乎要比前往爪哇来得方便。加之当时三佛齐王国（即室利佛逝王国（Sriwijaya））版图辽阔，国力强大，南海之地为其属者九十五，^③它控制着当时中南交通的孔道——马六甲海峡和克拉（Kra）地峡，特别后者意义重大，中国船只运载乘客和货物，每每在地峡东岸登陆起卸，通过地峡，再在西岸明船继续前进，这样可以大大缩短航程，^④因此中国商船和移民南航者大多首先集中在三佛齐王国。从当时中印之间的宫廷贸易来说，三佛齐与中国的交往频繁，也不是同期的爪哇所可拟其项背。据宋史记载，自建隆元年（960）至淳熙五年（1178），三佛齐国遣使献贡来中国者凡二十六次^⑤，而爪哇国遣使来中国者，仅四次。^⑥商业往来的频繁定然有利于移民前往定居。至于宋时三佛齐已用中国文字“上表章”，^⑦固然说明当时中国影响之深，但也决不能证明当地中国移民定居之早和定居之众。

外岛华侨人口领先这一趋势，到了元朝似乎又由新的华侨聚居地的形成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西里伯的望加锡，当地人民曾流传着他们是十三世纪为逃避蒙古人入侵前来定居的南中国移民的后裔，^⑧我们未始不可由此推定元初已有中国居民前往西里伯定居。在加里曼丹西南端的勾栏山（Gelam），“元初军士征南婆，遭风于山下，……有痾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逐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什而居之。”^⑨印度尼西亚学者Boejong Saleh说，勿里洞之出现中国人聚居的村落，始于1293年元军出征爪哇。^⑩

到了明初，苏岛华侨又再度增加：洪武三十年（1397）梁道明据三佛齐，“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⑪以最低限度二千家计，每家五口，仅三佛齐一地，闽粤军民移居者当不下万人。这个数目征之十年后三佛齐头目陈祖义率部之众，并不为过。永乐五年

①《宋史》卷489，阁婆传。

②《元史》卷210阁婆传。

③《元史》卷162，史弼传。

④《诸番志》，三佛齐国条。

⑤萨奴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第27页。

⑥《宋史》卷489，三佛齐传。

⑦同上，阁婆传。

⑧同上，三佛齐传。

⑨V. 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第454页。

⑩江大渊：《岛数志略》（1350年左右撰），勾栏山条。

⑪Boejong Saleh：《东印度公司以前定居印尼的中国人》（Orang² Tiongkok di Indonesia sebelum Kompeni）载印度尼西亚《觉醒》周刊（Mingguan Sadar）56年第34期。

⑫《明史》卷324，三佛齐传。

(1407)九月,“郑和使西洋诸国,还至旧港,遇海贼陈祖义等,遣人招谕之,祖义等诈降,潜谋要劫,和觉之,整兵提备,祖义兵至,与战大败之,杀其党五千余人。”^①这五千余人当然是成年男子,再加上老幼妇孺,三佛齐华侨人口之众便可想而知了。而同一时期的爪哇华侨人口则缺乏类似的记载,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推定:在1400年以前,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的分布,外岛多于爪哇,而外岛又以苏岛旧港为著。

显然在同一期间,爪哇华侨人口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也在不断积聚,大约到了1400年以后,爪哇华侨人口就超过苏岛,日益取苏岛的地位而代之。1225年宋赵汝适著《诸番志》,提到杜板(Tuban)时说“居民架造屋宇与中国同”,^②而未言及华侨,更未言及华侨人口之众。但是到1413年马欢游爪哇时,杜板及其邻近已是华侨聚居之地。这中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首先是宋亡,南中国居民避难爪哇,为数当在不少,致使今天爪哇人民自认为是十三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国后逃来印尼定居的华侨后裔。^③到1300年爪哇满者伯夷王国兴起,^④杜板成为当时王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⑤华侨来此贸易和定居者,日益增加。到十四世纪后半期,满者伯夷王国日益强盛,拥有强大的海陆军,经常南征北战,^⑥1397年出兵“破三佛齐,据其国,改其名曰旧港,三佛齐逐亡。”^⑦此后,“三佛齐渐致萧条,商舶鲜至”,^⑧而爪哇则随着满者伯夷王国的兴起成为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中心,华侨来此贸易和定居者日众,1413年马欢游爪哇时,杜板已是华侨聚居之地,“此处约千余家,以二头目为主,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泉人流居此地。”^⑨革儿石(Gresik即今锦石),华侨定居之众竟辟其地为“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⑩再自此东行至苏儿把牙(Surabaya,即今泗水),“番人千余家,其间亦有中国人。”^⑪如果按五口之家计算,新村一地,即有华侨五千余人,其余两地如华侨占半,则1413年东爪哇华侨人口合计约达万人,这已接近1397年国粤军民泛海三佛齐从梁道明者“数千家”的水平。

而同一时期的三佛齐,如果郑和所败陈祖义,“杀其党五千余人”的记载是属实的话,那么随着政治经济的衰落,华侨人口也在迅速下降。革儿石之命名“新村”,三佛齐之易名“旧港”,未始不是象征华侨人口的地位变化。

①《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三佛齐传。

②《诸番志》,卷上,陈吉开条。

③V. 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第454页。

④莱佛士:《爪哇史》,第1卷,第106页。

⑤萨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第197页。

⑥同上,第71—72页。

⑦《明史》卷324,三佛齐传。

⑧《明史》卷324,三佛齐传。

⑨《瀛涯胜览》,爪哇条。

⑩同上。

⑪同上。

此后爪哇华侨人口又有新的发展,1415年马欢途经泗水时,仅述其地“番人千余家,其间亦有中国人。”而没有提及中国人之众;1617年张燮写《东西洋考》时,则述泗水“港旁大洲,林木蔚茂,千余家,强半是中国人。”^①不仅这样,这时候西爪哇还出现前此文献所没有提到的新的华侨聚居地——万丹万丹。(下港)在张燮笔下已是“四通八达之衢”,华侨在此之举足轻重竟然达到万丹国王须“立华人四人为财付”。^②万丹城内有繁盛的华人居住区,^③人口多达数千人,^④他们不仅“忙于经营商业,而且勤于经营农业、种植胡椒和酿酒”,^⑤胡椒是多年生作物,从播种到收成需历时4至5年^⑥从胡椒的种植也就说明中国移民在此定居的永久性了。

万丹之外,又有加留吧(Soenda Kelapa)^⑦,这就是荷印殖民时代的吧城,印度尼西亚教授Soekanto博士说:“当1400—1500年加留吧还没有成为一个贸易港口时,中国人的胡椒船就驶此。……到1596年荷兰船只第一次到达加留吧时,中国人已在那里定居设坊酿制亚力酒了。”^⑧1611年东印度公司曾以1200元(西班牙银元real)的代价,向万丹王驻椰城代表购得坐落芝利翁河(Tji Liwoeng)东岸华人居住区内的一块建筑用地,面积约50×50平方呎,^⑨从这块建筑用地之广,就可以想见当时椰城的华侨人口已经多到足以形成一个宽广的居住区。

这些都说明1400年以后随着爪哇之日益成为印尼的政治经济中心,印尼华侨人口的分布也日益集中于爪哇,从而华侨人口中心也就日益由外岛转到爪哇。

当然,外岛华侨人口的分布也随着这个过程在变化。例如加里曼丹南岸的勾栏山(Gelam)在1293年元军征爪哇,经此地遇大风,留病卒百余人居山中,^⑩到了明初永乐三年(1405年),此百余病卒竟不断蕃衍,使“其地多华人”了。^⑪又如香料群岛文老古(Moluccas),元朝文献仅仅提到其地产丁香,“每岁望唐舶贩其地”,而没有提到华侨流

①《东西洋考》,卷三,下港条。

②《东西洋考》,卷三,下港条。

③Vermeulen《红溪惨案本末》,椰城中译本,第3页。

④(日)岩生成一:《下港唐人街盛衰变迁考》,载《东洋学报》,第31卷,第4期。

⑤Vermeulen:《红溪惨案本末》第3页。

⑥莱佛士:《爪哇史》,第1卷,第238页。

⑦《东西洋考》,卷三,下港条“加留吧下港属国也,半日程可到,风土尽相类之。”

⑧Dr. Soekanto:《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诞生以前的椰城》(Sedikit tentang hali-hwal Kota Djakarta Sampai Lahirnja Republik Indonesia),载《椰城建城429周年纪念》(Djakarta 429 Tahun)特刊,1956年版,第40页;又de Haan:《老吧城》(Oud Batavia),1922年版,第1卷,第74页。

⑨de Haan:《老吧城》,第1卷,第12页。

⑩《岛夷志略》,勾栏山条。

⑪《明史》,卷323,麻叶瓮(Billiton)传。

寓其间；^①到了明朝，则其地不仅有华侨流寓其间，而且流寓华侨足以游说西荷两国平息兵争。^②

外岛华侨人口在入数和地区分布方面尽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在增长速度和积聚程度上，似乎还不足以与爪哇华侨人口相提并论，这一点我们从当时中印宫廷贸易的发展变化也可以得到旁证：自明洪武三年（1370）到永乐元年（1403）的三十三年间，爪哇国使贩货来中国者先后凡十一次，平均每三年来往一次；1403年后，往来更为频繁，或“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到1443年始以“朝贡频数，供亿费烦”，改为“三年一贡”。^③而同一时期的三佛齐仅在洪武初期（1371—1377）遣使贩货来中国三次，1377年之后“其国益衰，贡使遂绝。”^④这个转变恰好与宋代的情况适得其反，既然贸易往来会有利于移民的定居，那么更多的贸易就未始不意味着更多的移民。

总之，到荷兰人东来为止，华侨人口的分布已遍及印度尼西亚各大岛屿，在人数上，大约1400年以前以外岛为多，1400年以后则以爪哇为多。

爪哇华侨人口之后来居上的趋势，在荷兰人入侵后的前二百年里，即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更为加速。东印度公司出于种种原因，或是需要假手华侨进行对华贸易，或是需要役使华侨进行生产建设，不得不大力招徕中国移民。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移民前往印度尼西亚，几乎都积聚在爪哇一地，因此爪哇华侨人口有了进一步的增长。（详见后文讨论）而同一时期的外岛则不存在这一现象。

在加里曼丹，虽然我们不能说荷兰人东来后就没有中国移民前往定居，但是根据文献的记载，大批华侨之移入加里曼丹，是1760年以后的事，^⑤这一年有一只中国大船到达三发（Sambas）湾停泊，向三发苏丹借地居住，并就地开矿种地，此后才有其他华人接踵而来。“兰芳公司”的创始人罗芳伯是在1772年率领同宗一百余人前往西加里曼丹的，^⑥看来在1770年以前，加里曼丹并不存在大批的中国移民。

苏门答腊的情况也一样，大规模的移民是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为适应开发锡矿的需要而出现的，邦加锡矿是1710年开始开采，到1725年才开始提到锡矿工人中除本地人外，还有中国人。^⑦勿里洞虽然早就知道有锡矿存在，但在1825年荷印政府勘探锡矿时，岛上并没有任何开采活动，^⑧所以大批中国移民之前往勿里洞是在1851年荷兰人了解该矿

①《岛夷志略》，文古老条。

②《明史》，卷323，美洛居传“自是岁构兵，人不堪命，华人流寓者游说两国，命各罢兵。”

③《明史》，卷324，爪哇传。

④《明史》，卷324，三佛齐传。

⑤见P·J·Veth：《西婆罗洲》（Borneo's Wester-Afdeeling）第298页，1854年版。

⑥V·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第489页。

⑦凯特：《荷印中国人的经济地位》第204页。

⑧同上。

具有开采价值以后的事。^① 招募并雇用大批中国劳工的苏东烟草种植业则是迟到1864年才开始建立的，^② 峇眼亚比亚比（Bagan Si Api Api）的中国渔民居留地也是迟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逐步建立起来的。^③

至于印尼东部岛屿的情况就更是如此：在香料群岛一带，中国人虽然比荷兰人早二个世纪到达，但是从欧洲人入侵以后，中国人前往这一地区就困难重重，与当地居民的通商贸易，每每招致飞来横祸，人货俱空。《东西洋考》说：“向时舟所携货，有为红毛夷所特需者，倘遇佛郎机，必怒，谓此舟非关我辈来，直是和兰接济，将货掠去，且横杀人，故必缄固甚密，不令得见。若红毛人见有佛郎机所需货，忽亦知之，介纷之后，稍息睚眦，然一渊两蛟，商彼者亦难矣！”^④ 商船往返已是如此困难，移民定居更是谈何容易。总之，在1854年香料垄断贸易宣布废止之前，这一地区并没有中国人活动的余地，而在此之后，由于香料群岛的衰落，也没有什么足以吸引中国移民前往定居之处，既没有种植园，也没有锡矿场。安汶岛（Ambon）就是一个例子：尽管在十七世纪初，荷兰人为了经营安汶岛，一再招徕中国移民，并且在安汶市设置华人街，委溪里必丹，但是由于中国商人的香料贸易损及公司的垄断利益，中国商人的勤奋俭朴招致荷兰商人的妒忌排挤，因此安汶荷兰殖民政府一再限制中国移民的入境。安汶华侨人口在十七、十八两个世纪始终停留在300人左右，到十八世纪末才增至400人，二十世纪初，才增至500人。^⑤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邻近爪哇的帝汶岛（Timor），1616年9月12日东印度公司总督燕·彼得逊·昆在给帝汶商业官Crijn van Raemburch的指示中说：“如果中国人前往帝汶贸易，你们必须遵照前发指示，没收他们的货物，并且把他们加以驱逐。”^⑥

在新几内亚及其他小岛上，虽然中国人与当地居民有过贸易往来，但并不值得重视，因为整个地区直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一直是海盜出没之地，谈不上大量的移民定居。

所以在荷兰人入侵以后的前二个世纪里，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的分布仍然是继续十五、十六世纪的进程，集中在爪哇岛上。这一点我们从稍后所公布的统计材料中，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荷印政府从1860年起开始每隔十年公布一次包括外岛在内的全印度尼西亚人口数字，根据这份资料，1860年印尼华侨三分之二在爪哇，三分之一在外岛，外岛

①Allen：《印尼和马来亚的西方企业》（Western Enterprise in Indonesia and Malaya）第1956年版。

②凯特：《荷印中国人的经济地位》第226页。

③凯特：《荷印中国人的经济地位》，第211页。

④《东西洋考》，卷五，美洛居条。

⑤（日）岩生成一：《安汶岛初期的唐人街》，载《东方学报》，第33卷，第34期。

⑥H·T·Colenbrander：《燕·彼得逊·昆东印度商务文件集》Jan Pieterszoon Coen，“Bescheiden omtrent Zijn Bedrijf in Indie”，第1卷，第432页，1923年版。

⑦V·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第496—497页。

之中又以苏岛及加里曼丹为多，分别占华侨人口总数的18.2%及11.5%，至于西里伯、摩鹿加、帝汶、巴厘、龙目等东部岛屿的华侨，合计起来还不到总数的3%，如果我们考虑到苏岛华侨是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加里曼丹华侨是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开始大批移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出在此以前爪哇华侨人口的集中程度了。

1860——1930印尼华侨人口分布概况

年份 (%)	华侨总数 (人)	爪哇、 苏门答腊 (%)	苏门答腊 (%)	加里 曼丹 (%)	西里伯 (%)	摩鹿加 (%)	帝汶及其 所属 (%)	巴厘、龙目 (%)	合计 (%)
1860	221,138	67.46	18.29	11.56	2.08	0.40	0.28	—	100
1870	250,350	67.24	19.19	10.38	2.39	0.32	0.33	0.15	100
1880	343,493	60.19	27.28	8.93	2.02	0.28	0.30	1.00	100
1890	461,089	52.51	36.41	7.82	1.90	0.33	0.23	0.80	100
1900	537,310	51.50	36.79	8.91	1.82	0.30	0.29	0.29	100
1905	563,449	52.39	34.64	9.85	2.11	0.41	0.28	0.32	100
1920	809,039	47.42	37.59	10.26	2.87	0.51	0.46	0.89	100
1930	1,233,114	47.23	36.37	10.89	3.36	0.71	0.56	0.88	100

来源：根据1938年《荷印统计年鉴》第41页数字计算。各岛具体人数请参阅附录一。

印度尼西亚华侨集中爪哇这一趋势，到东印度公司关闭之后就逐渐开始转变，随着十九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人们的日益重视外岛和开发外岛，外岛华侨人口也日益上升，根据1860——1930这七十年的户口统计，外岛华侨除加里曼丹一地增加幅度仅四倍外，其余各地都增加九至十倍不等，但是同期的爪哇华侨人口只增加三倍。这种增长速度的不一，大大改变了华侨人口的分布面貌：十七、十八世纪大部份华侨分布在爪哇，经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则大部份华侨分布在外岛，就中除加里曼丹一地人口比重变化不大仍然维持在过去的水平外，其余各岛比重都分别增加了一倍左右，而爪哇人口的比重则下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如果我们把华侨人口比重不大的东部岛屿略而不论，那么一个世纪来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的分布变化，就全部表现在爪哇华侨人口比重和苏岛华侨人口比重的一升一降上面，爪哇华侨人口比重的下降几乎就是苏岛华侨人口比重的上升，前者下降20%，后者上升18%。这样，在华侨人口分布上，苏岛又逐步恢复了它往日的举足轻重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结论：一千多年来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的分布变迁，在1400年以前，是外岛华侨人口多于爪哇，就中又以苏岛为著。1400年以后，爪哇华侨人口就日益居来居上超越外岛，这个变化一直继续到二十世纪初期，前后共五百年，其中

前二百年(1400—1600)爪哇华侨人口积聚速度缓慢,后二百年(1600—1800)积聚速度加快,到最后一百年(1800—1900)速度又减慢。二十世纪以后,外岛华侨人口则急起直追,终于超越爪哇而再度成为华侨的人口中心。

至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如果要考察荷属东印度公司时期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的变迁,显然,爪哇华侨人口是一个值得深入的重点。

(三) 一千年来爪哇华侨人口的分布情况

1500年以前爪哇华侨人口中心在东爪哇,早期以杜板为代表,后期以锦石为代表。——1500—1800年爪哇华侨人口中心自东向西移动。前一百年以万丹为代表,后二百年以巴城为代表。——1800—1956年爪哇华侨人口中心开始自西向东移动,前一百零五年以中爪哇的三宝瓏为代表,后五十年以东爪哇的泗水为代表。

既然爪哇在很长的时期里,始终是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中心,那么在爪哇本岛上,华侨人口又是怎样分布?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探索而又饶有兴趣的问题。当然,历史文献不可能为我们留下足以连续描述整个时期的分布变化的资料,但是根据断片的记载,也仍然可以摸索出若干移动趋势来。

自从十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么一千多年里,爪哇华侨人口的分布中心大致经历了二次反复的变化,即分布中心自东向西移动,又自西向东移动。

从史料来看,大约在1500年以前,爪哇华侨人口以东爪哇为积聚中心,1225年宋赵汝适写《诸蕃志》时曾说:杜板“居民架屋宇与中国同”,①这未始不旁证当时杜板已有不少的中国移民。到明初(1413)马欢随郑和下西洋途经爪哇时,就不仅杜板、甚至锦石和泗水也有许多中国居民,并且就中锦石华侨人口还超过杜板,因为锦石千余家尽是中国居民,而杜板千余家仅部份是中国居民。所以如果说宋时爪哇华侨以杜板为多,那么明时就应以锦石为多,这个变化是与当时爪哇国际贸易港口的盛衰更迭密切关系的。“大约在1400年以前,爪哇最重要的商港是杜板;……1400年以后,锦石变为爪哇的最重要港口。”②不过,不论是杜板还是锦石,都在东爪哇,即当时华侨人口中心应在东爪哇。这从郑和七下西洋的航程安排上也可以得到说明,尽管七下西洋的前途停靠口岸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但是从随同郑和三次下西洋的马欢游记里、以及随同郑和四次下西洋的费信游记里,

①《诸蕃志》,卷上,苏吉丹条。

②萨奴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印尼文版,第248页。